



历史上的今天

张俊杰 主编

(六十九)

目录

9月29日	1
国内.....	1
1860年咸丰命恭亲王向英法侵略者求和.....	1
1887年黄河南岸决口.....	10
1917年北京政府通缉孙中山等革命者.....	11
1938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12
1957年北京天文馆开幕.....	12
1972年中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13
国际.....	15
170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新东印度公司合并... ..	15
1758年英国著名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出生 ..	16
1901年费米出生.....	19
1902年法国作家左拉逝世.....	20
1904年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	20
1913年狄塞尔去世.....	40
1915年西奥多进行首次横贯大陆的无线电电话通话	46
《慕尼黑协定》诞生	50
1986年美苏间谍事件.....	51
9月30日	55
国内.....	55
162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逝.....	55
1927年“三湾改编”	55
1948年共产党员王孝和在上海惨遭国民党杀害 .	5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赛福鼎为主席	56
1981年叶剑英提出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	64
国际.....	65
1862年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出台	65

1895 年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出生.....	69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濒临结束.....	72
1946 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	73
1965 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动乱.....	78
1974 年巴西著名足球球星贝利因受伤引退。...	78
10 月 1 日	79
国内.....	79
559 宇文觉称帝国号北周.....	79
1367 年朱元璋俘吴王张士诚.....	82
1841 年清将葛云飞等抗击侵华英军.....	83
1949 年毛泽东发布政府公告.....	84
1949 年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	84
1949 年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青海省解放 ..	86
1979 年民族英雄岳飞墓重新开放.....	89
国际.....	92
1838 年第一次阿富汗战争爆发.....	92
1932 年英国宣布伊拉克独立.....	98
1953 年美国与南朝鲜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101
10 月 2 日	107
国内.....	107
1894 年日军在花园口登陆.....	107
1949 年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	119
1979 年《辞海》修订完成.....	125
冯玉祥大军南下西安	127
郑士良等发起惠州起义	128
国际.....	129
1187 年阿拉伯联军收复耶路撒冷.....	129
1847 年德国军事家兴登堡出生.....	132

1925 年世界上第一个电视雏型问世.....	139
1960 年尼日利亚独立后举行首次国会.....	146

9月29日

国内

1860年咸丰命恭亲王向英法侵略者求和

关于洋务派与传统文化资本的初始陨落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所谓“象征资本”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它与文化资源相区别。具体地讲，文化资源具有开放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中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起码的空暇时间、经济支持等基本条件，就能够占有它，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一种优越性的地位；而文化资本则具有垄断性，为社会上少数人所占有。它具有资本的一般特征：交换价值。比如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的交换。文化资源可以向文化资本转化，这种转化，据皮埃尔·布迪厄看来，是在知识制度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可以这么说，在国家权威的介入、认定下，文化资源的一部分通过制度化实现向文化资本的转化。

观照有清一代，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制度化保障是科举，士子在科试通过后，将被授予科名，只有在此时，儒学知识才转化为文化资本，因为获取科名意味着成为绅士，或者进一步拥有官职，即使只是成为下层乡村绅士，也会拥有以科名为倚恃获得的许多特权。换句话说，绅士可以把代表着其拥有儒学知识的科名作

一种资本来实现与其他资本的交换。比如经济上的偷漏赋税、霸占田产等；政治上干预司法权力；同时乡村绅士在教化、伦理上拥有一种公认的社会威望。

鸦片战争前，由科名承认的传统文化资本一直处于独尊地位。虽然历次科试内容都会有所不同，但其重点一直未离儒家经典。近代以后，传统资本开始受到愈来愈强劲的冲击，这主要表现为西学作为一种新文化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一起参与向文化资本的转化，而且其所占比例呈现着愈来愈大的趋势，从而使传统文化资本的交换价值受到公开的质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资本在近代开始走向陨落。由于传统文化资本的获得与科举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传统文化资本的陨落与废科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却因其有着比废科这种纯制度上的变更更广泛的思想文化价值认同上的内涵而具有滞后性，也因此，即使在 1905 年废科后，科名奖励制度却持续到 1911 年。人们对科名深深的眷恋，使传统文化资本的陨落过程非常漫长。而成规模的冲击是从洋务派的新式取才实践开始的。

一

洋务派的取才有了显然不同于以往的新标准。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而中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可以用来笼统概括洋务派的取才标准。其显著的特征是注重实用，这不仅表现在其对西学的选择利用上，也表现在对中学的规定上，并贯穿于其认为人才所应具备的整体知识结构中。

中学作为洋务派强调为体的素质，却并非简单地对儒学的概指。对“中学”的遣词，洋务派官僚论说不一，最为常见的是“道”、“伦常名教”等。如冯桂芬说：

“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薛福成的卫道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王韬则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但从他们大量的奏议及其与顽固派论争中可以推论，洋务派所崇奉的中学与整体的儒学事实上并不相等，至少，在儒学各派别中，他们是有所倾向的。突出的表现是其对愈来愈狭隘的科试内容的不满。

科举系于皇朝利益，故此，科试内容完全随皇帝意旨不时调整。如“乾隆二十二年以前，除考四书文和经文外，兼考论、表、判等，其中论题均选自朝廷支持的宋朝程朱理学”，但乾隆二十二年后，“与实际的行政事务较有关系的表、判的考试题目停止了”，“乾隆五十八年以程朱理学为内容的论题也停止了”。再如“策问”一场：“康熙三十八年（1699）‘策问’还包括一些现实问题，如吏治和河工”，“但18世纪末以后，策问改为讨论哲学问题”。到19世纪下半叶，科试内容只剩下时文、诗赋、小楷这些与实际毫无关联的东西，且“考官一般只注重形式”。

对这一项士子们一向不敢妄议的“成法”，洋务派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就明确指出：“……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后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奏折中措辞更为激烈、直接：“然今日之时文、诗赋、小楷，人皆知其无用而不敢轻议”。洋务派对“虚”文的大加鞭挞从反面表现

出其所谓“体”的中学主要指经世之学。这从洋务派官员，尤其是几个洋务大员的学术倾向中上可以看出。如曾国藩论学主调和汉宋，且又是近代自强运动的首倡者；李鸿章功利心更重，其幕府“首重经纪庶务之才”；左宗棠曾告诫其长子说：“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举也。”

当然，注重实用最多的还是表现在对西学的选取上。洋务运动三十多年，从学习语言文字到制船造炮之法到天文算学、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从军工企业到民用企业到航运业、架电线、修铁路，无不是实用思想的推动。

这样，对人才的要求不再只是时文、诗赋、小楷，甚至不再只是儒学，而是经世之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在总体的知识结构中，中学与西学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固然，中学、西学一直为“本”、“末”所区分，但对中学“蹈虚”的认识，以及面对紧迫时局士大夫们的束手无策，都使西学在无形中不仅仅限于“末”的位置而被凸显出来。

二

洋务派的新式人才观是对传统文化资本的一种强烈冲击，必然会触及传统官绅的利益，因此在实践中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阻碍。洋务派每前进一步都不得不百倍谨慎、瞻前顾后，处境十分艰难。

首先是同文馆的设立。语言是涉办洋务的首要困难。咸丰十年恭亲王奕訢在奏折中认为，与外国交涉，“必先识其性情”，因此请“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得到皇帝谕准。同治元年（1861）京师同文馆成立。后上海广方言馆和

广东同文馆也相继奏请设立。

但科举对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垄断（也有“异途”出身的士子，然其社会地位较低，特权也小，因此很受歧视。）使得士子把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压在了读书应试上。因此，为招揽学生，同文馆不得不联系科举，实行了科名奖励制度。这固然还不算先例，在乾隆二十二年俄罗斯馆就已实行，但后有改动，致使“升途稍隘，而学习者渐不如前”，因此奕訢等请准仍“照旧例办理”。

科名奖励制度还未触及到科举仕进本身，这使学习“夷语”虽然受到士大夫们的鄙弃，但终未受到大的阻碍。然而，自强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使洋务派的取才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翻译人才的培养上，恰恰相反，这只能是第一步。在创办军工企业、仿造轮船的过程中，洋务派很快意识到“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工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因此上奏请准添设一馆，专习天文、算学。且不止于此，还要延聘西人为师，又虑及学生“年幼学浅，于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只以功力分用，速效难期，若再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于是把眼光对准了已仕的士子，“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入馆学习。

科甲正途官员接受天文、算学的教育，意味着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将不再纯粹，而是有了西学文化资源的加入，这立即给崇奉传统文化资本的绅士们带来了恐慌。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顽固派向洋务派发起了攻击，表面上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且似乎很宽宏的退一步，道即便要重

天文、算学，也不必延聘洋人。但当洋务派以退为进，请旨准倭仁督饬办理，保举精通天文、算学之人时，便偃旗息鼓了。这场争论事实上是新旧文化资本的冲突，顽固派之一通政使于凌辰的话倒切中了要害，“夫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由此，中学地位便遭动摇，传统文化资本地位自然下降。

这在事实上已经影响了科举仕进。其实因为传统上的人才与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对应模式，使新式取才必然、也必须触动科举。洋务派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以多种方式请求变更科举，仅直接奏请的就有“道光中，两广督臣祁奏开奇才异能五科，内有制器通算一门；咸丰初年，御使王茂荫亦曾言之；同治九年，闽浙督臣英桂等奏开算学科，先后部议，皆以格于成例中止。”

直接变更被驳回，洋务派又力图在表面上绕过科举，寻求一种与科举同时并举的方式。如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上奏：“……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18]后山西道监察御使陈启泰上奏请求：“变通科举之制既有所难，可否特设一科，专取博通掌故、练达时务之士……发往沿海各省委用。”

屡遭驳议后，洋务派又提出学贯中西的新方法，企图寻找与科举调和的道路。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中说：“……不若改京师太学及直省书院为经世书院，令举贡、生员有心经世之学者以充学生”，学成后“其有通达古今政体、才大识远、兼通各科之长而足以胜大任者，则渐用为卿贰，可通以为大臣之选。”已颇有创见。光绪十三年，有官员发明出录取算学生员，

并仍准参加乡、会试，只是策问内容有别，另编字号的方法，并指出“如此虽不必特设专科，而此项人员，其学则参究中西，实事求是；……进非他途，不至为时论所轻。”后这种方法为朝廷采纳。

变通科举的艰难，使洋务派力图从别的途径提高习西学士子的社会地位。自同文馆设立伊始便定好的科名奖励制度一直在实行。同文馆题名录上优生升途明确规定：“每三年举行大考后，择优奏保官职，自八、九品衔起，至分部行走。其在京者仍留馆肄业读书，并在本衙门充当差使；其课业较精者，或派各省差使，或派出洋差使。”如同治七年总理衙门保奏：“严良勋、席淦二名给予内阁中书职衔，并作为附监生，俾得就近于北闱应试；监生汪凤藻、汪远、王文秀三名，给予国子监学正职衔。”规模最大的一次保奏是在光绪十一年，包括曾出洋留学的学生，共计 138 名学生得到奏保。后同治十三年，刘坤一奏请凡通洋人枪炮兵船的“即给予不次之富贵。苟能世其业，则世其禄而世其官。”光绪五年罗应旒在企图调和中西之学的奏折中也提出了要对学成“机汽、算学、重学、电学之类”者，“荣以禄位，与部臣等”，并特别指出“初设之时，更加优待，以开风气，不然儒者所不屑学也”。这道出了新文化资本确立的艰难。因此有必要从制度上人为的提高其地位，周盛传在筹办海防的奏折中主张在沿海各省设洋学局，揽通西学者，其任职三年后“如有成效，即奖擢升阶”，特别强调“与正途出身无异”。

此外，洋务派于新式人才还另辟了一条道路，即为荐举。如郭嵩焘曾荐举邹伯奇、李善兰。除对这种道听得来的人才举荐外，荐举人才大量的出于幕府。于此有

突出贡献的幕府主要是曾国藩幕和李鸿章幕。曾幕具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特点，它为洋务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许多洋务大僚如李鸿章、李翰章、左宗棠、郭嵩焘、刘蓉等都出于曾幕。但曾幕主要的作用是镇压太平天国，稍后的李幕起于太平天国末期，与曾幕特点有很大不同，“其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任务，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因此，李幕于洋务贡献最大。

李幕人物功勋卓著者，“如黄芳、应宝时、和涂宗瀛，他们均曾任江海关道。。。。他们之得任斯职，均系由李鸿章的奏保，后来黄以病废，应则官至江苏按察使，涂则官至湖广总督。”而“如郭嵩焘、刘郇膏、郭伯荫、丁日昌、王凯泰、钱鼎铭、李元华、倪文蔚、刘瑞芬和徐文达。均先后官至督抚。大抵除郭嵩焘另有凭借外，其余均以淮幕起家。”其他幕中人物虽多为低级功名甚至无功名，却因富有实际才干而为李鸿章重用，较著名的有留学生伍廷芳、马建忠，买办商人盛宣怀、朱其昂、唐廷枢等。

比较科举官宦升转，幕府荐举更为迅捷有效。曾、李两幕保荐人数众多，且出多位封疆大吏，形成湘系、淮系规模，对晚清政局影响很大。这不仅冲击了科举仕进，更从事实上大大冲击了传统文化资本的独尊地位。

三

如上所述，洋务派在新标准下进行了育才、取才的艰苦努力。从总体上看，洋务派的新式取才在两个方面扩大了范围。一是培育新式人才的对象。最初只是使幼童习“夷语”，后扩至举贡、生员（见上述罗应旒折），

后竟把目标对准了翰林院，“再，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素优，差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程功必易。”

另一方面是新式人才适用范围的扩大。这与学习西学知识的深度同步。最初学习语言的只是用于翻译场合，后学习天文、算学的用于军工制造等方面，从同治七年“只有通商省分及有教民省分相需甚殷”到光绪十年时，则“如遇交涉事件，恐难以空疏无据之材而肆应，自不得以远距海疆，阙焉不讲”，于是张之洞出“延访洋务人才启”。远离海疆省份尚且如此，可见几乎是全国性的省分都要求洋务人才的引进。

总之，到19世纪70年代末，洋务派的努力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效：“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器器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可见，在仕进升途及人们的思想上，洋务已深受重视，传统文化则不再是士子赖以炫耀、倚恃的唯一资本。

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明，即是1898年，湖南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分别代表新旧两派进行了一场文字斗争。这时，康梁民权说被斥为妖孽，而被拥为正统的却不是清流派的主张，而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这表明科场内的正统已经悄然发生了位移。可以推断，如果没有洋务派三十年的努力，这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正统的位移即可看作传统文化资本初始陨落的标志。

1887 年黄河南岸决口

黄河下游是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河床平均高出地面 4—6 米，被称为下游人民头上的“悬剑”。十多年来，由于黄河来水持续偏枯，河槽泥沙淤积加重，河道内又出现了 3 至 5 米高的“悬河中的悬河”，给防洪造成巨大压力。

据介绍，黄河进入下游后，河道陡然变宽，河道面积达 4 2 0 0 多平方公里，其中 8 4 % 是滩地，滩地之间下陷部分是过水河槽。来水正常年份，黄河携带的泥沙 3 0 % 淤在槽里，7 0 % 淤在滩上，河道状况为“滩高槽低”。可近十多年来，黄河来水偏枯，9 0 % 的泥沙淤在河槽里，远离河槽的滩面因水沙交换作用不强，淤积厚度减少，出现河道内“槽高滩低”，滩地又高于堤外地面的“二级悬河”局面。目前，黄河下游河段已全部为“二级悬河”，较为严重的“高悬”河段达 3 0 0 多公里。

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专家说，在“二级悬河”的条件下，一旦发生较大洪水，将造成重大河势变化，黄河主流有可能横走、斜走，甚至出现滚河，黄河主流将直冲大堤，增大了“冲决”和“溃决”的危险。2 0 0 2 年 7 月，黄河首次调水调沙试验中，局部河段流量不足 2 0 0 0 立方米每秒时发生漫滩，漫滩水流直冲大堤，这说明治理“二级悬河”已成为黄河治理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黄河下游“二级悬河”治理试验工程 6 月 6 日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工。施工人员将对濮阳市南小堤至彭楼约 6 公里长的河段进行疏浚，以增大河槽过流能力，为今后大规模治理“二级悬河”积累经验。

1917 年北京政府通缉孙中山等革命者

关于北洋军阀及其政府要从北洋大臣谈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多。1861年，清政府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称北洋通商大臣，加“钦差”名义，按惯例由直隶总督兼任，管理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通商、交涉事务，兼督海防和其他“洋务”。历史上，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达28年，专办清政府外交，兴办北洋海军，经办洋务，权力炙手可热，他的继任者袁世凯也同样，以至于北洋大臣的地位远高于同级的南洋大臣。

军阀是指拥兵割据一方的军人或军人集团。北洋军阀就是由袁世凯建立的封建军阀集团。1895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北洋大臣，所建军队称为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就任大总统，进一步培植党羽，扩大势力，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是为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统治中国，从1912年3月至1928年12月，长达16年之多。关于北洋政府的性质，尤其是它的阶级属性，史学界颇有争议。

（1）封建专制政权。北洋军阀是封建军阀，北洋政府名为共和，实为专制，从废除《临时约法》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对内独裁，对外卖国，北洋政府的本质与清政府并无二致。

（2）带有买办性的封建政权。北洋政府的社会基础复杂，不仅有封建余孽，而且有君主立宪派，其中还不

乏带买办性的大商人。大资产阶级。北洋军阀各派分别投靠各帝国主义国家，成为各国在华代理人。

(3)带有封建性的大资产阶级政权。由于辛亥革命的伟大影响，推翻了清朝政府，不仅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北洋政府也继续推进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民国初年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除了客观的国际原因以外，与北洋政府的政策也不无关系。当然，由于北洋政府带有严重的封建性，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有限。

关于北洋政府的性质，建议查看一些相关的论文。

1938 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的意见。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

1957 年北京天文馆开幕

北京天文馆是中国第一座大型天文馆，目前仍是大陆唯一的大型专业天文馆。

北京天文馆的设施由天象厅、门厅、展览厅、报告厅、天文台等组成。

门厅放置着傅科摆，背景的壁画上有郭沫若同志的题词。天象厅可以说是最吸引游客的地方，直径 23.5 米半球形的建筑可进行天象表演，使人如同置身旷野仰望星空，展览厅面积为 400 平方米，展览内容是以图片，模型和实物形式的天文知识展览。另外的圆廊及门厅的二

层环廊也布置有临时性展览，或不定期的专题展览。天文馆设有两座天文观测台。既对观众开放，又有观测任务，观众可以亲自观看太阳黑子。

馆内设有天文望远镜专卖店、天文科普书店、儿童乐园。

1972 年中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人民世代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同一天，大平外相宣布同台湾当局断交。

附录：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有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

毛泽东主席于九月二十七日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始终在友好气氛中，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就两国间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同意发表两国政府的下述联合声明：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